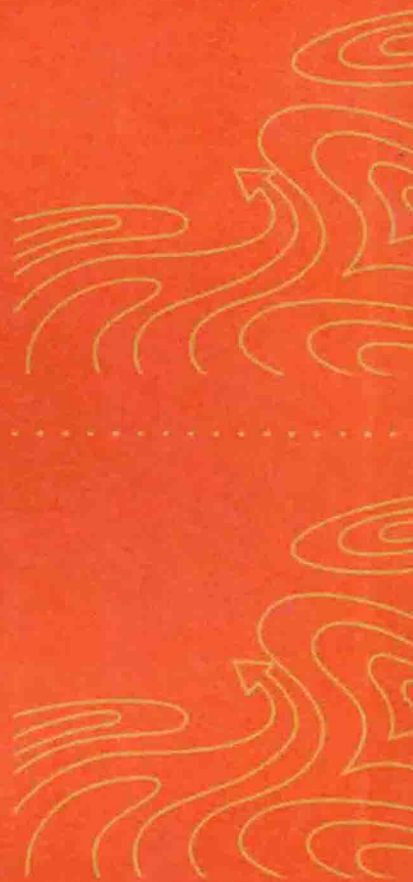




大转折

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本质论

轩传树◎著



Great Trans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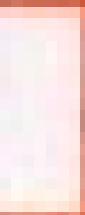
On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China Road



大转折

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新论说

张其成等著



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新论说
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新论说

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新论说

大转折

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本质论

轩传树◎著

Great Transformation:
On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China Roa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转折: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本质论/轩传树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520-0673-5

I. ①大… II. ①轩…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9201 号

大转折: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本质论

作 者: 轩传树

责任编辑: 施恬逸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3

插 页: 2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673-5/D · 292

定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轩传树博士,是著名社会主义史研究家、我的老友徐觉哉教授的学生和助手,早在他做徐老师的研究生时,我们就认识了。时间荏苒,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亲见他在上海这个现代国际大都市,中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源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重镇里,茁壮成长起来。现在,他不仅取得了博士学位,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课题,还担负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国外社会科学前沿》常务副主编等重要学术项目负责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学研究界的新人。最近,他在参与和主持国家项目研究的基础上撰成的一本论著《大转折——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本质论》即将出版,希望能够为之写几句话。

这自然是责无旁贷的。笔者从事社会主义教学和研究半个世纪,对这个话题的研究意义早已了然人心,甚感国家社会科学创新人才培养任务十分重要,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教研队伍的建设已是迫在眉睫。看到轩传树博士这样后起之秀,矢志不渝地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成果,自是十分欣喜,能够为他们的发展当一块垫脚石更是感觉无上荣光。

据笔者对当前学术研究状况的了解,中国道路的研究,是一

个问题和纷争、挑战和难点的密集区,因而也是一个创新、创造空间巨大广阔的学术领域。可以说,把中国道路作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位课题,是一个睿智且深沉的学术抉择。几年前,有出版社同志来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出版选题时,笔者就感慨过,这些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著述,全国可能有数十套,但是多是按照原来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的模式套下来的。从抽象的纯学理上看,这种多册组成的丛书是完整而系统的。但仔细品读下来,它们往往不是对当代中国历史事实与历史进程与时俱进的最新概括,而是给当代中国人民活生生的历史创造贴上某个现成的标签或塞进既定的框架,内容千篇一律,文句也多有雷同,因此无法消解人们的疑惑和迷茫,也就少有人问津和鲜有社会影响了。

实际上,当初邓小平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时就告诉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从社会主义学理中演绎出来的,从任何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而是从中国现实的社会土壤和五千年历史文明中生长出来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历经艰辛开创出来、建设起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很长时期都会处于建设探索之中的,中国特色也是不断在时代潮流中充实丰满起来的。摸索、试验、建设之中的制度和理论,也远没有完整、成熟、定型。邓小平曾设想 30 年后也许可以大体成型,这也是就大的架构和发展方向上而说的。他晚年说过,“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不断创造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生生不息的变革进步历程,不会停留在某一点上。如果急于求成地、一步到位地构建完备制度和系统理论,就容易陷入演绎前人

和别人的现成结论、墨守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观点的境地,而落后于历史变革、世界发展的丰富实践。如果用在书斋里杜撰出的一套观点去观察与框正实践,很可能会站到时代的对立面。我们的研究一定要与时俱进地着力于中国道路,即中国人民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时代,开拓国家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纷繁多彩、日新月异的发展变革进程,概括新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进程,继承既有认识成果,又总结实践最新经验,揭示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即中国式的社会历史观,建立起相应的话语体系。这样,不仅能够提出对当代中国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科学阐明,适时地总结成就、发现问题、回答质疑、迎接挑战,而且能够及时地就发展道路和战略问题与各国的认识成果进行交流和比对,让我们的发展步伐更加坚定而顺畅,使国际朋友更加易于理解与思考。

上述这些是笔者的玄想,也是轩传树博士新作的立意。作者在广泛占有历史的、现实的、学术的资料、精心地梳理中国道路研究的众多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各种问题、争论、质疑和挑战,坚持唯物史观,大胆进行意识形态创新,实现从制度手段走向价值目标的研究范式转换,重构了一种以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为核心的解释框架,比较系统地开拓了一个中国道路研究的新思路。阅读书稿催人思索,下面再写几句零碎的讨论。

正如本书绪论中所言,这些年来,人们已经对中国道路进行了多种探索,提出了诸如经验—模式、现状—趋势、制度—手段等等不同视角。他们回答了中国道路取得成就的原因,阐明了中国道路的具体特色,也指明了中国发展需要攻克了许多难题,但是对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或疏于阐明、或浅尝辄止。本书的一个主要立论和创新点,就是依据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理论、世界

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共识、当代中国发展变革的新鲜经验和当今时代的发展主题,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包括物的生产、人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生产的环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归结为健康持续、共同富裕、合作与和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四个维度,并依据这一体系化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来研究与评断中国道路的全部实践和战略策略。不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本质,而且分析了中国前进道路上遭遇困境的根源,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灿烂前景。因此,本书确实是一部顺应时代发展、积极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新作。

本书的解释框架和传统思维大相径庭,但却完全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它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必须随着人们所处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也是继承了中华文化从来坚守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思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60 多年,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新道路 30 多年,这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开展的史无前例的改变世界、振兴国家的全历程。中国人当然有必要、有理由,也有条件冲破那种因循旧章的思维,提出符合当代中国历史实际和发展逻辑的解释框架,对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作出新阐明。

作者还对本书创新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来源给出界定:这种“创新”不是从无到有的另起炉灶,而是在既有的理论上建构一种基于“价值—目标”的话语系统;在这里“理论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最新成分”的社会主义。在笔者看来,不另起炉灶而在既有理论上建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弘扬。中国学人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个当代学术

使命。

笔者想补充的是，一定要坚定彻底且深入系统地进行这个理论基础和理论来源的再塑和创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需要锻造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首先，以人的解放、发展、自由的价值追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争取人的解放，实现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家首先提出来的。他们高举人道主义的鲜明旗帜战胜了中世纪统治人们头脑的封建神学，建立起民主的共和的新制度，把人类历史推向一个新的现代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代都是在当时先进的人道主义思潮熏陶下成长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and 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家阶级价值观的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继承与吸收其科学成果，进行历史观的彻底变革，形成了“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即以人为本的辩证唯物的历史观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实现了人类社会思想史最伟大的飞跃，创立了最先进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把他们追求的未来更高社会形态表述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在那里，“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恩格斯在晚年系统总结其历史观时作出这样的概括，他们的历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结语中，特别引述了历史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一段话来表述自己对未来社会的理解：“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

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在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已经完全吸收了这些光辉灿烂的思想,并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点遗憾的是,本书在这方面的阐述似乎有些过于拘谨而开掘不够,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的人的发展学说着墨不多。在信息化、互联网时代,人性、人的本性、人的潜能,都进入了难以想象的境界。希望作者能够大胆且理直气壮地把这个重大课题研究进一步提到反映时代进程的新水平。

笔者还想说,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作为中国道路的研究依托和解释框架,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明遗产在 21 世纪条件下的复活和提升。人类的全部历史,归根到底,就是人类不断认识和探索自己解放和发展规律和道路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成果,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关于人类争取解放和发展的科学。中华历史文明作为一种文明,本质上也是一种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学问。儒学经典《大学》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求人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的先贤还提出诸如天人合一,相依相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仁者爱人,见贤思齐,见利思义,义利双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和为贵,以邻为善,天下为公,大同之世等等一系列丰富的珍贵思想。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要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道德精髓,挖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些重要成果的时代价值,做好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综上所述,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价值追求,从来就是中华历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难看出,中华历史文

明,在核心价值观上和马克思主义是有机的相互衔接、必然的彼此沟通的。以为作为人类文明伟大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和由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创造的有五千年璀璨历史的中华文明互相脱离、彼此对立,从历史事实和发展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立不住的。应当懂得,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必然的本质要求,绝不是什么外加的东西。学术界的一个紧迫的重要任务,就是在价值观建设上,对中华历史文明的丰富遗产进行现代化的开掘、创造性的转化,形成现代中国的话语体系,以武装全党、全国人民的头脑,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思想武器。这正是本书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作者运用新的解释框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事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在书的结语中,很有历史力度地强调我们的事业“路漫漫其修远”。

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急躁病,是 20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一个思想根源,坚持中国道路仍然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和智慧。俄罗斯共产党为什么搞了 74 年的社会主义,实现了工业化,宇宙飞船上了天,最后还是回到了东正教?说到底,就是以为社会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忽视了人性的塑造和提升,丢弃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追求,是走不远的,是必以失败而告终的。

邓小平对此有最深刻的认知。在 1992 年南方谈话中,他提出,在我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他还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那个“初级阶段”。对此,至今不少同志还是不能理解。唯物史观阐明了人类社会必然走向没有压迫剥削掠夺、自由

平等公正的新社会。但这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存的时代、自己的国家都能够看到它的完全实现。实现它的条件的复杂艰难性,即使现代人也难以想象。人类历史充分表明,人性、人心、人的本质的涵养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也是最艰难最漫长的历史变革过程。邓小平吸取沉痛历史教训,遵从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阐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培养“四有新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重要的原则。这些都标示,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个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已经日益地深深地扎根于中国道路的理论 and 实践之中。这就是我们道路正确和成功的根底所在。

掩卷沉思,让满头银发的老学人不能不充满信心。时代的召唤、历史的催动、世界的潮流,必定使轩传树新作这样研究中国道路的学术创新,如春潮滚滚,汹涌澎湃,形成 21 世纪中国学术繁荣的新景观。

奚广庆

2014 年 7 月 3 日

于北京世纪城观山

序 二

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转折：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本质论》一书，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轩传树副研究员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模式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人类文明发展研究”基础上，历时数载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吸引了世界目光，同时也因其充满着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文明要素的纠结甚至胶着状态而给人们正确认知中国道路的性质、未来及其意义带来困难。就中国道路研究的现状而言，无论是基于“经验—模式”的视角，还是基于“现状—趋势”以及“影响—意义”的视角，都属于“制度—手段”的研究范式，即“突出中国道路在制度手段上相对于其自身过去以及其他发展道路/模式的结构特征，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道路为之追求的价值目标”。结果，同一条“道路”却在不同学者的视野中呈现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面貌和色彩。

就在国内外学界关注并尝试解释中国道路之时，作者勇敢地加入了这一行列，试图“用常识理性、用国人熟悉的语言、用世界听得懂也听得进的话语，把改革开放 30 余年的中国故事讲好、讲通，把期间所形成的中国道路的社会性质和未来走向讲清楚、讲明白”。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没有“机械地”去照搬传统的学说，也

没有“简单地”去解释现实中的困境,而是转换了研究范式,从制度手段走向价值目标,从而重构了一种社会主义的解释框架。

本书力争从这一研究范式出发,对那些不同“面貌”和“色彩”背后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追问,对涵盖民族复兴、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多重任务的系统工程进行多方面、多视角的论证,并将这个理论框架运用于中国社会现实,审视中国道路所坚守的价值原则及其实践对于价值目标所实现的程度,以弄清“我是谁”,又将“向何处去”等一系列亟需回答的问题。因此,本书可谓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一本具有自身“特色”的论著。

在以往的社会主义研究中,历来存在着两种视角,一种是“制度社会主义”的视角,即把目光始终仅限于经济的必然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社会阶级结构特征、阶级冲突与制度更替等一系列所谓科学性的维度上,而完全排斥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论证;另一种是“价值社会主义”的视角,即把社会主义的依据从客观经济必然性转移到道德、正义之类的纯精神“因素”上来,认为社会主义者不需要依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而只要寄望于对剥削现象的厌恶和对平等尊严的伦理追求。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之后,后继者们并没有按科学与价值有机统一的要求发展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的理论论证和实践论证过程中,“左”派以及后来的第三国际更多地突出它的科学维度和体制架构,最后走向了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而第二国际的中派和右派则片面地强调它的价值维度,这种纯粹价值论证方式后来成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逻辑。事实上,无论是纯科学性的制度维度,还是纯伦理化的价值维度,都很难解释现实社会主义,因为现实社会主义毕竟存在过(并继续存在着)东西方不同的实践路径和发展样式。

这些年来,作者阅读了大量社会主义经典文本,并在主持完

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欧洲左翼政治格局变迁研究”中翻译了英国工党理论家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这些经典文本,尤其是克罗斯兰关于“‘社会主义’不是关于国有化,也不是关于国家控制,而是关于人的尊严,关于在一个相互支持的共同体中给予每一个个体实现自我潜能的平等权利”的价值原则论述,使作者认识到“科学”与“价值”两者之于社会主义的意义,认识到价值原则在科学性基础上的重要作用。这就促使他转换研究视角,并力图在科学维度和价值维度的结合上去破解中国道路的本质所在。

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它一直是一个困扰中外学术界的“司芬克斯之谜”。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经典社会主义设想中的理想社会主义,而仅仅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后的社会主义,这已为世人所认同。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个分歧意见就大了。要说清楚这一问题,有必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去加以观察和思考,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去加以把握。十多年前江泽民同志让我们把握三大规律,直到2013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都是为了更好地从历史发展规律上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

我们知道,唯物史观有两个基本理论:一是社会形态理论,就是坚持生产力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与合力论的有机统一;二是历史过程理论,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学习唯物史观就要求树立社会形态思维与过程思维。社会形态思维,就是善于从社会结构状况出发来把握社会发展状况,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结构性存在,事物的结构状况影响事物的发展

状况。过程思维,就是强调什么阶段做什么事,不能把未来才能完成的任务拿到今天来做,也就是不能犯落后于历史阶段或超越于历史阶段的错误。

用这种思维去看待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一理论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实际上,它是一个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下发展资本文明、占有资本文明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的社会主义如何占有资本文明的探索,回归和丰富了马克思以资本的力量推动文明进程的理论。

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功地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后却很少有人去探究跨越后的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及其现实社会主义在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国外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晚年对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社会形态相互更迭的历史过程的认识动摇了,在他看来东方的村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而发展。这样,似乎就不需要规范历史发展的道路,东方社会似乎也不需要受历史必然性的制约了。在苏东国家碰到严重挫折后,各国理论界才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国内的情况看,已有不少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论证,但很少有把这一问题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说,在讲社会主义个别的时候,忘记了社会主义的一般,有的干脆回避矛盾或绕圈子。这样既看不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也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区别,使科学理论处于一种任人摆布的局面,要么庸俗化,要么教条化。

事实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后,都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并不等于这些国家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历史极限的全部历史使命。在我看来,只要资本的

运动尚未完成它的历史普遍性,那么还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完成发展和占有资本文明这一前提性历史任务。这样,就需要经历一个“市场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外壳下,进行资本的运动和资本的积累,完成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形式下所实现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痛苦历程,从而完成资本的历史极限所能容纳的全部历史容量,全面占有资本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为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以此来看,跨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同样需要一个“进行资本运动和资本积累”的过程,需要一个“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的过程,需要一个“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自我的过程。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作者看来,对于这条道路,“我们说它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体现在改革过程所坚持的价值追求以及价值目标的实现上;我们说它是‘特色’的,主要表现为改革所带来的制度变迁及其变迁过程的阶段化和个性化。这里,制度与价值是统一的。如果说之前的价值目标的实现或接近是由于制度变革的结果,那么未来制度变革的方向也就体现在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

今天,“中国仍然存在着一系列发展问题,甚至是一些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发展困境,中国共产党人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困境和挑战面前,除了以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去克服重重困难,除了在本来没有路的地方硬闯出一条新路之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退路可走”。

中国道路的未来,“在于继续深化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实现的制度和体制障碍,包括那些在改革过程中曾